



【刊前絮语】

## 何为斯文

□徐静

“船中还有王君的一个三岁的小孩同去，更令我们喜悦。他从宋君手里要葡萄干吃，每拿几颗须唱一出歌加以跳舞，他便手舞足蹈唱‘一二三四’给我们听……他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小人儿，而且一口的济南话，我在他口中初次听到‘俺’这一个字活用在言语里。”周作人在《雨天的书》里，曾写到他1925年到济南讲学的情形，文中提到逛大明湖时王君带的那个三岁孩子，便是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王祝晨之子王浩，也是本版《七家村：教育与革命部落》一文的作者王恒的哥哥。

大约在1931年，王祝晨一家从济南广智院街搬到七家村21号居住，那时王恒已十几岁。这个七家村，本是农田荒野，在一师七位教师的“开拓”下，几年间变身为济南有名的教育部落：七家村的“村二代”学习大都很优秀，外地工作求学者也人名气大，因此吸引很多济南人进村居住，想给予孩子更好的熏陶。我在《济南文史》中曾读到对七家村的描写：“那些教师和文化人们，初夏多穿中式褂裤，冬天则是长袍马褂或再加上条长垂的围巾；有的穿中山服，也有身着西装革履，一手揣在裤袋里，一手握拿着一份报纸刊物，迈着潇洒从容的步伐，皮鞋有节奏地叩着路面，要么去上班、会友，或是社交评析时弊、交流研讨、启蒙民众等。”

斯文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，就这样隐匿于七家村中。而这充满书香味的斯文村风，与七家村众多教师之家的家风有直接关系。就以王祝晨先生的家教为例，王祝晨对子女功课实行大包工制，只要他们如期交货，必尊重其人格，从不再加苛求。同时对子女成长中的缺点，引导多于斥责，暗示多于批评。例如抗战胜利后，王祝晨从大后方回到济南，发现与别离8年多的王恒在情感上有些隔阂，他没有解释丢下母子南下的原因，而是给王恒借来屠格涅夫的《父与子》，然后再像是无意中询问王恒阅读小说的心得体会，他们从漫谈到长谈，甚至偶有争论，很快消除了误会。

只可惜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七家村如今只保留有名字，教育部落或革命部落的风貌却再也寻觅不到了。

《繁华落尽寻齐东》是人文周刊“消失的古县”系列的第六篇，也算是小小的结尾。有数据显示，我国千年以上古县800多个、千年古镇1000余个、古村落更是数以万计……在今日的齐鲁大地上，不少古县城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。这些古县城是现代城镇化城镇的基础，也是来自久远年代的人文财产，尽管今天看起来，它们的名字已经显得陌生——寿张、蒲台、堂邑、滋阳、藏马……“咱们山东省的行政区划，有一种习惯的说法：水浒一百零八将，山东一百零八县。”看得出，作者张永红对山东地名颇有研究，他曾研究并分析，齐鲁大地上消失的老县大概分为三种情况：一种是因行政区划调整需要，存在时间较短的县份，如建国初期的五龙县、牙前县等；第二种是县名更改，老县名消失，如滨县、益都、掖县等；还有一种是源远流长、历史悠久的百年或千年古县被撤销，如齐东县、蒲台县、长山县等。这些消失的古县，承载着古老的文化，记录着古代的地理人文，是祖先留下的根脉。读完古县系列，我们不由感慨：流传千古的老地名，坚强，却也脆弱。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  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  
本版编辑：徐静  
美编：马晓迪  
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在济南有一处由教师自发组建形成的村居——七家村，从最初的七名教师选址占地建房，到鼎盛时期有150余户人家，住户以教师为主，与鞠思敏、范明枢并称为齐鲁四大教育家的于明信、王祝晨也先后居住在此，原本的农田荒野悉成连片宅第，逐渐成为济南著名的教育村落。身教胜于言教的优良村风，更吸引了一些为子女前途考虑的济南人，积极搬迁入村居住。



于明信、王祝晨都曾在七家村居住，图为上世纪20年代，于明信之子于道泉（左站立者）与齐鲁大学同学合影，前排左一为王祝晨之女王非曼。

齐鲁四大教育家，一个村里住着俩

## 济南七家村：教育与革命『部落』

□王恒

### 营造“君子国”之风

上世纪初，几位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堂、执教于省立一师的教师，不愿再租赁房屋过漂泊不定的日子，经过几年省吃俭用，他们商议一起购地建房。大概在1917年前后，祁锡育（字蕴璞）带头发起寻找地皮，7名教师选定了青龙桥附近一片荒地，大家一致通过在此盖房定居，定名为“七家村”。

这7名教师中以杨毓泉年龄最大，除了祁蕴璞，还有于明信（字丹绶）、王俊千、吴天墀、田信卿、吴级晨（一说为孙云海，编者注），当时他们都颇有教学名望。从买下地皮到房屋基本落成，这中间又有他们的学生和亲戚朋友陆续来村，如生物教师孙云海、画家周爱周，此后每年都有住户陆续迁入，最多时达到150余家。至解放前，七家村东西有数里长，南北有一百多米宽，内中有十字交叉的两条小道。

最早来的七家中，以祁家最为清贫，儿女多负担大，但他仍然认真教学，一丝不苟，在地理方面有一大批著作问世，后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“名誉会员”称号。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在山东教育界更是闻名，从1916年开始任一师校长。受其言传身教影响，长子于道泉自小聪颖，不到13岁就熟背《英语小字典》，22岁就掌握了世界语，被称为语言天才。国画画家吴天墀以画虎最为有名，解放济南后，他为了保护我省被破坏的国宝级字画，放弃了自己的画虎特长，主动担起了画作整理和恢复原状工作，一干就干到退休。

模范教师田信卿是有名的理化教师，吴级晨英语教学非常闻名，教育家王俊千解放济南后任济南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。著名的教育家王祝晨，大约在1931年夏秋之交，全家搬到七家村21号居住。他们共同营造出大有“君子国”之风的部落，并逐渐扩大形成村风。

七家村街道上的清洁卫生工作，都是大家自觉打扫，特别在大风大雨、暴风雪之后，村里道路水多泥泞，各家都争先恐后

出来打扫、运土铺路。村里很少出现打骂现象，见面都有礼貌，师生相见，必然学生先称呼老师，对老师鞠躬，等老师走后自己再走；老师与老师相遇，相互问候，年轻的让年长的先行。年节都是先看望长者再相互走访，青年们见面谈的多半是国家大事、教育动态。

### 七家村历经三次搬迁

该村建成后，逐渐向人们证实了一个道理：身教胜于言教。这些教师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着邻里，不只是长辈爱读书，孩子们学习也蔚然成风。晚饭后或节假日，互相研讨学习问题、向教师请教的情景随处可见。到了寒暑假，常有老师免费开补习班，有时三五天，有时一两个星期，全部义务授课。

在好学、追求进步的学风熏陶之下，村里的学生考试大都名列前茅，有的会考成绩为全省第一二名。不仅如此，村里的老师们还注重德育教育，假期里会让自己的儿女去做社会实践，以便孩子早日认识、熟悉社会，例如暑假叫他们去学修补自行车，每日弄得满身油污；或在节假日叫子女早起卖报。于道源（于明信次子）和王浩（王祝晨三子），1936年暑假就整整卖了一假期的报纸。这些教育试验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，有的人为了子女前途，积极搬迁入村居住。

后来人满为患，因为村东有围子墙，七家村只得向西、北、南三面发展，以扩建住房。渐渐地，七家村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“教育部落”。

抗战开始后，七家村里去延安或参加抗日队伍的人多了起来。到济南沦陷时，该村大都为老弱病残和幼儿，这是建村后的第一次搬迁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，抗战后投向解放区的前后有二十余人，其中于明信的四个子女都去了延安；王祝晨带六百多名学生辗转到四川绵阳成立国立六中；其他跟着学校南下的有十余家，辗转到国外学习工作的有七八人。

日伪时期，该村住户变得复杂，各行各业住户都有，但汉奸没有一个能住长，不是下台，就是调动；而中小学校教师是越住越多。抗战胜利后，原居民有的从后方回来，搬来的教师更多了，村风也就逐渐恢复起来。这次的搬迁是缓慢的，前后有两年多，算是第二次大搬迁。到解放济南后，该村还有第三次大搬迁。

### 当之无愧的“革命部落”

从建村起，进步思潮就出现在七家村的许多家庭，在“五四运动”前后，这里已成为进步思想的“传播站”和“大本营”。

于明信、田信卿等与鞠思敏、王祝晨共同参与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活动，如“五四运动”爆发后，组织青年学生团结全市62个团体，在5月7日召开“五七国耻纪念大会”，还与学生们一起搜查日货、散发传单，在街头讲演。及至后来反对军阀迫害学生的“大舞台”事件、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发起的纪念大会等，住在七家村的老师都走在前面。此外季羨林、臧克家、李广田（著名散文家）、李长之（著名文学史家）、邓广铭（著名历史学家）作为王祝晨的学生，也是王祝晨先生家的座上宾客。

七家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当数祁锡育长子祁天民（原名祁延霏），受父亲祁锡育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，这位当时在考古学界已颇具威望的学者，看到日本侵华，立即投笔从戎，于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。党中央派他到新疆开展工作，牺牲时年仅30岁，被追认为新疆死难九烈士之一。于明信次子于道源，抗日战争期间投奔延安，后从罗荣桓、肖华115师总部挺进山东，被罗荣桓元帅称之为“干将”，在进军临沂途中，发生激战，壮烈牺牲。

济南沦陷后，1937年入住王祝晨家的王馨华本是东北流亡学生，来济后在青龙街三皇庙小学任教。离婚后，王祝晨夫人同情其遭遇，接其家住，以姊妹相称。王馨华任黑虎泉小学教师时，注重教育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和创新，特别是在日本奴化教育的环境中，巧妙利用各种方法，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。她在1943年加入中共地下党，王家住处也成为地下党济南市第二党支部所在地，她曾被日本特务二次拷问，受尽严刑但始终不屈，后牺牲时年仅37岁。以上仅写出几位，那些埋头苦干的进步人士更是数不胜数。因之七家村被外界誉为“革命部落”毫不逊色！

1958年初夏，大跃进开始，政府圈定该村拆除，要建设“山东省农工商联合办公大楼”（此为当时名称）。一声令下，七家村全部搬迁，七家村这个曾经的教育与革命“部落”，终于宣告“寿终正寝”。



七家村的很多住户都是当时省立一师的教师。图为省立一师旧址。